

黄 陂 文 史

第 三 辑

黄陂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黄陂县印刷厂 印刷

字数：14万 印数：3500

工本费：1.50元

目 录

人 物 春 秋	黎元洪小传	5
	百岁自述	8
	潘怡如生平	33
	刘凤章事略	41
	彭善其人	45
	我所知道的詹钧	48
	污吏蔡谦	55
	我与冯疑过从片断	60
烽 火 岁 月	溥仪到横店一日记	64
	我所走过的路	70
	涂晓帆烈士二三事	90
	蔡店红学	95
	日寇在甘棠铺犯下的罪行	102
	日寇烧杀周李家田暴行纪实	105
	抗日时期的姚家湾兵工厂	108
	几首抗战歌词的追记	110
	黄建民制伏蠡贼马长青	113
	活捉刘子烈	116
清宫轶事	三青团黄陂县分团部组建始末	119
	五峰剿匪侧记	124
民族宗教	王正起奉命捕杀安得海	128
	蔡店土家族	214
	基督教在黄陂	216

文 化 教 育	忆矢志教育救国的陈时	131
	热心桑梓教育的王一鸣	138
	陈世润捐资兴学	142
	旧时乡村的“游学”	145
	翰林琐谈	147
	清末科举童子试的形形色色	154
	凤凰寨上龙灯会	167
医 药 卫 生	长堰镇端午龙船会	171
	张都桥的木版年画	174
	胡天和药店	177
	昔日城关的药王会	179
	抗战前黄陂医药学研究会	181
治 水 篇	胡云卿和保生堂	184
	血吸虫病的危害及其防治工作	187
西 陵 风 物	民生大堤	193
	古老的盘龙城遗址（之一）	198
	黄陂八景	206
名 著 特 产	话说城门潭	212
	武湖银鱼	218
	润海楼名菜	220
读 者 来 信	李祥泰重糖烘糕	223
	对《革命烈士韩寿樵》一文看法	226
	我对《锄奸记》中失真一节的补正	227

黎元洪小传

湛志刚

黎元洪，字宋卿，生于1864年10月19日，祖籍黄陂北乡黎家河（今属大悟）。黎父朝相为清廷陆军游击。元洪14岁（1878年）时，随父移居河北省宁河北塘。1883年春入水师学堂，1888年3月以优异成绩结业，随后派往北洋水师见习。1891年到广东广甲舰上服役。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黎为广甲舰驾驶，奉命北上增援威海卫，在渤海与敌舰相遇，激战海域，广甲舰中弹触礁沉没，黎飘流海上10余时获救。

事后，黎去南京投到两江总督张之洞麾下，张委修狮子山炮台，成绩彰著，博得“总督”青睐。1895年11月，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时，携元洪同航至鄂任为护军马队管带。1897年至1903年之间，张之洞三次派黎赴日本考察，学习军事，晋升协统，加副都统衔。1905年湖北成立新军第二镇，黎为第二镇统制。翌年4月，第二镇编为第21混成协，黎为统领。

1911年10月，辛亥首义，武昌光复。因事起仓促（机密被泄，提前起义），主要革命党人均不在武昌，一时群龙无首，为稳定局势，遂有推借黎协统之议（黎甚负时望，且革命目标主要是推翻满人统治，不忌汉官）。此时，黎易便服

躲 在 黄 土 坡 协 部 参 谋 刘 文 吉 家 中 后 室 ， 被 革 命 党 人 侦 悉 搜 出 ， 其 时 黎 惊 恐 万 状 ， 支 支 吾 吾 。 众 人 安 抚 说 ： “ 我 们 不 是 要 谋 统 领 ， 是 来 请 统 领 出 来 主 持 大 计 的 。 ” 于 是 强 拥 黎 至 德 租 界 台 见 临 时 总 指 挥 吴 兆 麟 ， 吴 闻 黎 到 ， 令 部 队 鸣 号 举 枪 欢 迎 。 随 后 ， 吴 等 拥 黎 至 咨 询 局 （ 今 武 昌 红 楼 ） 筹 议 大 计 。 经 过 一 番 磋 商 ， 蔡 济 民 、 吴 兆 麟 提 议 黎 为 中 华 民 国 军 政 府 湖 北 都 督 ， 黎 辞 不 受 ， 后 在 革 命 党 人 规 劝 和 威 压 下 勉 强 应 命 。 随 之 以 都 督 名 义 ， 发 布 安 民 告 示 。 由 李 翌 东 代 黎 签 字 的 布 告 贴 出 后 ， 民 众 争 相 观 看 ， 欢 声 雷 动 ， “ 想 不 到 黎 协 统 也 是 革 命 党 人 。 ” 官 僚 政 客 纷 纷 依 附 ， 社 会 秩 序 稳 定 。

黎元洪初任都督时，成天愁眉莫展，神情木然。当看到阳（汉阳）夏（夏口）光复，湖南举义，大局可定，加有旧属亲信“黄袍加身”之进，才剪去辫子，登堂议事，签发《檄全国文》、《宣布满清皇朝罪状》、《檄各省督抚疆吏文》、《致满清宰辅重臣电》等文告。两次致书来鄂进剿起义军的清廷海军大将萨镇冰（原有师生之谊），劝其举义，共兴大业。萨提督览信后，颇为感动，表示不忍同族相残。籍存第二次《黎元洪致萨镇冰书》全文如下：

夫子大人函丈：前肃一函，早邀钧鉴，然至今未奉训谕，心中惕悚莫安。洪此次所以出督诸军之由，实出千万不得已，敢谨再上告于军门之前。洪当武昌起变之时，所部各军，均已出防，空营独守，束手无策，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避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吾师素知洪最谨厚，何敢仓

辛出此，虽视事数日，未敢轻动，盖不知究竟同志若何、团体若何、事机若何，如轻易着手，恐至不可收拾，不能为汉雪耻，转增危害。今已誓师八日，万众一心，同仇敌愾。昔武王云：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唯一心，今则一心之人何止三万。而连日各省投效之士，大半留学东西各国各种专门学校及世代簪纓，学有专长，阅历极富，并本省官绅人等，故外交着手，各国已认为交战团体，确守中立；党军亦并无侵外人及一切私人财产之事，不但在中国历史上视为创见，即各国革命史，亦难有文明若此。可知满清气运已衰，不能任用贤俊，致使聪明才智之士，四方毕集，此又岂洪一人之力所能致哉。即就昨日陆战而论，兵丁各自为战，虽无指挥，亦各奋力突进。汉族同胞，徒手助战，持刀协击损坏铁轨者，指不胜数。甚有妇孺馈送面包茶水入阵，此情此景，言之令人奋武。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非黄帝子孙，岂肯甘为满族作奴隶而残害同胞耶！洪有鉴如此，识事机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土，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共和国，维持世界和平。是以连日通告各省政府，遍檄各省同胞，劝其各自独立，以备联合，择定地点，公举大统领摄治。同胞欢迎此言，声震天地，敌一战而歼敌数百。方今满汉兴亡之机，兆端已久，不待智者而已明。洪之所以能明此大义者，一系吾师平日训诲之功。此次武昌之举，洪已审定确实，非如他项革命可比，以数小时之间，居然恢复武汉三

镇。其地有兵工厂、铁厂、织布局、纺纱局、麻布局、缫丝局，为全国商务上政治上之中心。今值交通之世，国都合建于此，始能与伦敦、柏林、巴黎、圣彼得堡、华盛顿相颉颃。刻下又夙闻永平秋操，满汉各兵亦突相哄斗，深如所云，则天运已定，岂人力所能为。洪受业于师，学识浅陋，不能担负重任，已向同志宣告，将以党军之所委托者，倩诸先生，登轮受求师究。昔人谓谢安云：斯人不出，如苍生何。同胞万声一气，谓吾师不出，如四万万同胞何。刻下局势，只要吾师肯出，救四万万同胞，则义旗所指，山色改观，以四万万同胞与数千满族竞争，以方兴之民国国民与运尽之清廷抵抗，华盛顿兴美，八年血战，吾师若出，将见不八月而亚洲地图之上，必有中华民国国旗飘扬也。知弟莫若师，知师亦莫若弟，洪虽不肖，不为旗人之奴，独不为大将之弟乎？时乎时乎，师一出，不但名正言顺，而实较胜于汤武。何也，盖汤武救民，犹自为帝，吾师救民，必不让华盛顿专美于前也。洪非为私事干求函丈，实为四万万同胞请命。满汉存亡，系吾师台一身，齐王反手，洪之计已熟；否则各同胞视为反对此志之人，即以敌人相待，虽洪亦不能禁其不邀击也。倘不以为妄，尚希训示只遵，当即率汉族同胞出郭欢迎。临颖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肃此敬请钧安。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受业黎元洪上。

由于先有默契，加之下级军官同情革命，10月28日，清军进攻汉口，萨镇冰曾以海军提督名义通知驻汉各国领事撤桥，以便炮击汉口起义军；下午3时，清海军舰队虽向青山起义军射炮700余发，但未造成重大伤亡。11月13日，萨镇冰过九江时，寄宿英领事馆，是夜召集各舰官员谈话谓：“本人侧身海军垂三十年，屡历战争，从未一获胜利。现在同室相残，即胜也不是为荣；长此迁延，既无以对朝廷，更不便附会民军。今以舰队付诸君，愿君等好自为之……。”翌日即离舰而去。嗣后，参谋官汤芑铭、海筹舰长黄钟英率海军响应革命。海军易帜，对阳夏保卫战役卓有贡献。

革命党领袖黄兴在香港闻武昌起义急飞上海，于10月28日抵鄂。11月3日，黎元洪在阅马场，设坛拜黄为战时总司令，迎战南下清军。在黄兴帅师血战下，阳夏战争坚持了40多天，为全国各省继起响应赢得了时间。

11月10日，黎致电已独立之各省派代表到武昌组织中央政府。会议公推黎元洪为中央大都督。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从海外回国的孙中山先生被选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兼湖北都督。同年2月南北议和告成，政府改选，孙中山以民族利益为重，让位给袁世凯，黎仍为副总统兼湖北都督。

南北议和后，黎为窃取首义果实和讨好袁世凯，利用革命党人的分化离刺，大肆剪除异己。1912年8月，黎密电袁世凯杀首义功臣张振武、方维于北京，次年又诛革命元勋蒋翊武于桂林。嗣后，大量裁军，兼行镇压，擢用旧属，排斥新人。1912年9月至1913年9月，先后被镇压的有“南湖马队”、“同志乞丐团”、“改进团”等保卫首义成果的倒黎

反袁活动。即使革命力量几被夷尽，然而，袁世凯对黎却不完全放心，忌其拥军自重，常思调虎离山。1913年12月8日，袁派心腹大将段祺瑞来武昌迎副总统入京议事，备有专车，即请上道。元洪无奈只得“入瓮”。当专列还在途中时，北京发布了总统令：任陆军总长段祺瑞权代湖北都督。自此揭开了北洋军阀统治湖北10余年的序幕。

1914年10月6日，袁世凯以金钱贿赂，武力相挟，强迫议员选他为正式总统。7日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10月10日二人同在太和殿宣誓就职。1915年12月，袁氏称帝后，三次册封黎为武义亲王，月银3万两，黎固辞不受（这时才看清了“庐山”真面目），并从瀛台移往东厂胡同蛰居。他曾以“反对复辟恨无力，赞成帝制决不可”的言词，表白自己矢志共和。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为民国大总统，就职后连发四道政令：各地讨袁军回原地驻防。恢复民元《约法》。改各省将军、巡按使旧制为督军、省长新制。撤销袁氏《惩办国贼条例》，释放政治犯。同年7月，任陆军总长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不计前嫌。但后来在对德问题上，二人观点尖锐对立，演成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矛盾日益激化。1917年5月22日，段祺瑞操纵的督军团在徐州开会，宣布独立，与中央政府脱离关系。5月23日，黎愤然下令，解除段的国务院总理兼陆军总长职务。6月，张勋领兵入京，借名“调解”实行复辟，黎被迫下台。

1922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企图窃取北京政府，玩弄“法统重光”，通电黎元洪复总统职；意在挟天子以令诸侯，元洪不察，仓促从天津赴北京就职。黎实为一愧

傀儡总统，大小事都作不了主，必须征得曹、吴同意，方能实施。

1923年，直系将官提出种种难题，逼黎退位，黎不得已于6月14日交出总统印，凄然回天津寓所。从此他致力实业，经营煤矿、烟草、盐业、面粉、纺织、石膏等。他除担任中兴煤矿、中美实业公司、震义银行董事长外，还兼任黄陂商业银行董事及南洋烟草公司等企业的董事。

1924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打败直系军阀曹錕后，于1926年电黎出山，再任总统。鉴于前次教训，黎氏坚不就范。

1928年6月3日，黎因脑溢血，死于天津寓所，终年65岁。

1935年11月24日，国民党政府为黎举行国葬，移墓武昌卓刀泉。

（根据《辛亥武昌首义史》、《袁世凯传》和黎氏族人提供的资料整理）

百岁自述

喻育之

一、青少年时期

我是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12月31日，出生在黄陂县喻家官塘一个偏僻的农村里，父亲喻扬学，是一个憨直、谦和、正派的商人，继承了祖父在黄石港开设的万兴、恒兴、义兴等几家农庄。母亲阮氏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

在家庭里，同胞兄妹9人，我排行第三。幼时，父亲送我上私塾。塾师是舅父阮静亭。入学时，父兄及亲友都希望我能进学中举，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在私塾里，学习内容从《三字经》、《千字文》到《四书》、《五经》，只是一味背诵，不作讲解。旧式的封建传统的教育方式，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萌发了不满情绪，但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法先王”的故事很感兴趣。由于勤奋好学，领悟较快，先生常以大器许之。

黄陂县南凭长江之险，北控英山之隘，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相传是为替父从军的花木兰的故乡。据《黄陂县志》记载：唐宋时期黄陂县一直是南北战争的要冲，这里流传着很多农民起义的历史故事。小时候，我时常听父辈们讲太平天国的故事，在脑海里留下“国之不存，何以为家”的思

想。

1902年，我随二哥来到汉口，在塾师拔贡李端恒门下继续求学。两年后，我和四位同学一起，又聘请黄冈举人尤嵩甫（声宸）先生教书。尤先生除教《离骚》、《史记》、《汉书》外，并叫我们阅读屈原，司马迁等传记，涉猎群书，使我产生对前辈学者的敬仰和以为师法的念头。

17岁时，我考入北京江汉中学，地址在北京郊区，校长水祖培，是翰林出身。这所中学是由四川、湖南、湖北等省为赴京应试（考举人）的人筹办的。教员中多为博学有志之士，他们痛恨满清政府对内欺压百姓，对外丧权辱国的行径。向学生介绍西方书刊阅读，灌输民主自由思想，同时讲述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和魏源等爱国志士的英雄事迹，以及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和力图振兴中华的“百日维新”、义和团反帝斗争等等。从这里，我不仅学到了近代科学知识，也开拓了我们的眼界和胸怀，提高了政治思想的认识。对满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在我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从而坚定我立志救国救民，革旧图新的思想。1908年，我因奔丧，回黄陂家乡。

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清光绪年间，张之洞任湖北总督，正值清朝腐败，外侮日亟之时，张之洞锐意维新，致力图强，除旧布新，力排众议。在湖北兴办了湖北枪炮厂、汉阳铁厂、布纱丝麻四局以及许多民间工业。在教育方面，创办了文武学堂。这时，科举废除，挽救民族危亡的维新思想已形成一种社会思潮。有志青年正在寻求救国之路。在黄陂家乡，我亲眼见到中国社会许多腐败现象，差役到处逼粮、

逼税，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妇女受到封建制度的重重压迫，我母亲和妹妹的两只脚被缠得变了形，走路都不方便。我妹妹竟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回乡的一个傻子结婚，无辜的成为封建婚姻的牺牲品。社会上强凌弱，富欺贫的现象随处可见。从而激发了我反对满清，振兴中华的思想，决心弃文就武。1910年，我考取武昌湖北陆军测绘学堂。

二、辛亥革命时期

19世纪末叶，外国侵略者纷纷入侵中国，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之时，我国大批仁人志士纷纷寻求救国之真理，认识到只有推翻满清封建统治，才能达到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目的。武汉地处全国中心，交通方便。经张之洞选派赴日本和欧洲留学的知识分子回国后，联合各军界人士，秘密建立“日知会”等革命组织，到辛亥革命前夕，这些革命组织联合归并成为“文学社”、“共进社”，在湖北新军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官兵加入了这两个组织。

这时，我正在陆军测绘学堂读书，每日除学习三角（大地三角测量）地形、制图、军事等课程外，夜间偷阅革命书籍，如《扬州十日》、《嘉定屠城记》、《湖北学生界》等书刊。以后又进一步阅读孙中山先生的一些讲稿文章以及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著作，开始对孙中山先生树立了信仰，也激励着我投身推翻满清，恢复中华的革命斗争信念。当时学校里，绝大部分同学加入了“共进会”组织，其代表人物是方兴、甘缉熙、李翌东、朱次璋等人。我经同学王寿介绍，加入了“共进会”。同学们经常在学校内秘密地、巧妙地传递革命信息，联络校外新

军代表，积极策划起义活动，形成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

在辛亥起义前夕，测绘学堂内曾发起一场剪辫子的风波。一天晚上，下自习课后，我和同学李翌东、戴维夏等一起准备了几把剪刀，在同学中宣布剪辫子活动，得到大多数同学的拥护。男人蓄发是满清统治者强加给汉人的一种风俗。被人们称为“狗尾巴”的长辫子，象征着满清王朝的封建势力对汉族人民的束缚。清朝官吏曾下令“剃前发蓄后辫”，剪辫子就意味着背叛，有杀头的危险。但是同学们已下定决心，就无所畏惧。开始我从寝室拿出一个脸盆翻过来，在上面画了一个圆圈，我首先在上面签了名，接着，同学们纷纷签名，然后，我转动脸盆，定下剪辫子的先后次序，不到半小时，100多名同学的辫子都剪掉了。事后，大家相互对视大笑起来，情绪非常高昂。

第二天清晨，校督办（校长）刘邦骥听到同学们剪辫子的消息，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他大声呵斥道：“你们吃大清国的饭，读大清国的书，竟敢这样胡闹，真是大胆已极，姑且各记大过二次，以观后效。”在场的同学毫无畏惧。我心里想，既然敢做，杀头尚且不怕，记大过又算什么！当时，湖北兴办的文武学堂里，除极少数甘当奴仆外，绝大多数人是拥护革命的。此后，剪辫子风潮逐渐蔓延到其他学校和新军军营，成为革命人宣传革命的标志。正如孙中山先生宣告的：“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民族运动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这时，起义条件成熟，大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

1911年10月9日，因孙武在汉口楚善里制造炸弹失事，清廷政府军警进行大搜捕。革命机关遭到破坏，彭楚藩、刘

复墓、杨洪胜三烈士慷慨就义。恐怖气氛笼罩武汉三镇，城门关闭，交通断绝，清兵继续搜捕革命党人，形势非常危急，革命党人被迫策划提前起义。

10月10日清晨，测绘学堂的大门紧闭着，校门口有三十标旗兵巡逻监视，同学们偶尔在操场探望。十五协统王得胜（人称大草包）大声呵斥道：“此刻军警正在捉拿‘革匪’，不与你们相干，你们好好读书去吧！”同学们暗暗骂道：“真是一个大草包，身为协统，却不知道我们都是革命党人。”

傍晚，学校上自习时间，忽然听到自工程八营方向传来的枪声。随后，方兴同学翻墙回到学校，手持两把指挥刀，一把交给李翼东，传令紧急集合，并大声宣布：“今天是驱逐满清的日子，大家随我整队出发，到楚望台领枪。”同学们个个精神振奋，身穿刚发下来的青呢制服，脚穿皮鞋，右臂用白布缠着，以作标志，出校门走在街上，十分雄壮，群众都说：这是孙文的革命队伍。

同学们来到楚望台，打开军械库，每人领得毛瑟快枪一支，子弹若干发。这时，各路起义士兵3000余人联合在一起，公推吴兆麟任总指挥，分三路向清廷湖广督署进攻。测绘学堂担任中和门至通湘门的守望任务，以防袭击。时值深秋，夜间冷气袭人，又一天没有吃饭，大家不顾饥饿寒冷，士气十分高昂。

在拉锯式的阳夏战争中，我们测绘同学也奋勇地参加了战斗。一次，我们队伍由武昌渡江到汉口，路经我家衣店门口，我高兴地向家人招呼说：“我们去打满清！”我二叔闻声赶来，双手将我抱住，劝阻我上前线。我极力挣脱，随队

恆前进，并说：“满清不灭，何以为家。”

辛亥革命取得胜利，武昌湖北咨议局前，竖起两面十八星红旗。

辛亥起义后，在武昌成立湖北陆军测量局，朱次障任局长，我和李南星、范义侠等任科员。任职期间，我深感学识不足，又参加湖北法律专科学校学习。

三、八次见到孙中山先生

我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是在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应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的邀请来到武汉。孙先生说这次来鄂的目的：一是调查战迹，凭吊忠魂；二是伤痛瓦砾，督促建设；三是哀思流离，抚慰疮痍。这次孙先生在汉停留5日，受到武汉各界的热烈欢迎。

4月10日，湖北军政界在武昌黄土坡外语专科学校举行欢迎孙先生大会。到会人员约300人。孙先生身穿长褂、神采奕奕，来到会场，随同前来的有章太炎、居正、庞青臣等。孙先生讲话，首先对参加起义军政界同志表示慰问和敬意。接着，作了题为“共和与自由之真谛”的演说。对革命同志不同意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产生不安情绪，作了说明。他说：“我这次辞职，外间传说我功成身退，其实不然，身退诚有之，功成则未也。”“我之辞职原因，一在速享国民的自由；二在尽瘁于社会事业；三在避免流血，结束战争”。孙先生还说：“功不须自我成，名不必自我居。”寓意无穷，发人深省。章太炎以双手拍大胯，赞赏不已。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欢呼“共和万岁”。从此更加深了我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和信仰，坚定我跟随孙中山先生，为实现三民主义

而奋斗的信念。

袁世凯窃居大总统职务后，控制军队，实行专制独裁。1914年5月，他又废除《临时约法》，颁布了一套“新法”。他所以黄袍加身，做起皇帝来。他不惜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于1915年5月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使中国为殖民地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复辟卖国的行为，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我与测绘局的同志们在局长李翌东的带领下，集会、游行、写文章，呼吁一切爱国同胞，投入反袁护国斗争。军阀头子王占元获悉，下令：“捉拿激进分子喻育之。”我被迫于1916年东渡日本。在日本私立日本大学读书，后进孙中山先生和日本犬养毅先生合办的政法学校学习法律。在这所学校任教的多是日本有名望的学者，如中村进午、器贺堪生等担任翻译的都是中国留日学生学成尚未返国的人。同学们自己组织了讲义编辑委员会，成员有四川的曾琦、云南的张天放，我是湖北的代表。在校期间，我被推选为留日湖北同学会评议长，旋被推举为会长。

1918年，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北洋军阀段祺瑞签订《中日军事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允许日本在中国驻兵和指挥中国军队。段祺瑞的卖国行为，激起留日学生的群起反对，我与同学们一起写标语、游行、示威，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日本当局为了镇压学生运动，派出军警到处逮捕游行学生。一次逮捕中国学生百余名，我也同时被捕。在狱中，我毫不畏惧，挥笔撰文警告日本当局，声明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是维护自己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在监狱里，有些日本人也是主持正义，反对侵略，支持我们的行动的。最后，日本当局不得不将我们释放。